学术专论

“内政外交实相表里”：从上海道台更易事件看庚子年政局

郑泽民

[摘要]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通过“东南互保”而免于庚子兵燹的上海，突然发生了更换地方行政长官上海道台的人事变动：时任上海道余联沅将由江苏候补道程仪洛取代。看似波澜不惊的官场迁转，却蹈入权力角逐与中外交涉的暗流。各国领事纷纷干涉，刘坤一、盛宣怀积极筹谋，李鸿章、荣禄、鹿传霖也牵涉其间，多股势力交织纠葛，使得这一任命延宕三月且屡更人选方才尘埃落定，最终符合各方利益的袁树勋成功执掌沪上。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考察，可以为把握庚子年的政局变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可直观体悟这一时期“内政外交实相表里”的政治情态。

[关键词] 庚子事变 上海道台 东南互保 晚清政局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1）－05－0113－013

引言

“上海道”全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一般简称“苏松太道”，下辖两府（苏州府、松江府）一直隶州（太仓州），自雍正八年（1730）衙署移驻上海县后，便有了“上海道”的习称。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道在监督府县官员行政、维持地方治安及监理江海关事务诸方面有重要执掌，是不可小觑的中层官员。鸦片战争之后，因中外交涉日繁，居官于华洋杂处之地的上海道在办理外交及洋务诸方面的折冲地位越发凸显，时人目为“南洋之门户，关道之领袖”，或以为系东南半壁自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之下最重要的职位。[1]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事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东南督抚主导的“东南互保”，便多得益于时任上海道余联沅的穿针引线，长江流域因而得免于兵燹，余氏也凭此举深获驻沪各国领事之信任。

[收稿日期] 2020-09-12
[作者简介] 郑泽民（1992 —），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济南 250199；1206272313@qq.com
①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9-20 页。

当下关于东南互保已有不少颇具分量的研究，[①] 亦有论者呈现对庚子政局饶有见地的观点，[②] 于笔者多有拨云睹日之助。惟既有研究多关注互保局面的形成过程，对于之后的余绪则鲜有论及；[③] 分析政局则更偏重议和、回銮、惩凶等重大事件，人物多聚焦于两宫、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等权力高层，而对地方具体实态的关照仍嫌欠奉。揆诸史实，在“互保”换文交涉完成后仅两个多月，便传来了沪道易主的消息，并在上海中外人士中引发不小震动。余联沅在“互保”一事上的具体活动，已有学者作过细致分析，[④] 而围绕其去职及换任等一系列人事纠葛，学界尚鲜有讨论。据目下所见，日本外交资料集大成者——《日本外交文书》中的《北清事变》部分，便有不少对此事的跟踪报告。[⑤] 透过这些记录，笔者发现上海道的更动并不能仅仅被视作一次寻常的人事变动，而是一场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及国外的不断施压下，持续三月才尘埃落定的权力拉锯。

东南互保后的上海并非风平浪静，上海道更易事件可以视为中外人士对互保的一次“抢救”，同时也可展现议和的主流之外，高层的权力博弈与中外交涉如何在地方的人事迁转上交相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中外资料，对这一事件作一考析，以期对庚子年清廷的内政外交实态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江南政坛倾覆之先声：“易道”消息的传出及列强反应

（一）“沪渎不可一日无观察”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尚驻跸山西的行在发出上谕：“江西按察使著余联沅补授，所遗江苏苏松太道员缺著程仪洛补授，钦此。”[⑥] 碍于通讯阻断，消息传到上海，已是一周以后。八月二十八日，身在上海的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去电报，指出“东南互保，余道一手办理，极为周洽，断难另易生手，致使各国因疑生事”，希望刘氏能够“设法奏留”。[⑦] 此电道出沪道更动之隐忧，即引发各国不满，将对东南安稳局面不利。而刘坤一在收到此电之前竟全然不知沪道变动之事，急忙在复电中询问盛宣怀：“余道有何调动？见谕旨否？另放何人？”[⑧] 盛宣怀又如实相复，并称“各国多有电达，似宜慰之”。[⑨]

---

① 参见王明中：《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与“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 年；戴海斌：《东南督抚与庚子事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郭继武：《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戴海斌：《外国驻沪领事与“东南互保”——侧重英、日、美三国》，《史林》2011 年第 4 期；戴海斌：《试析 1900 年“东南互保”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2014 年第 1 期，等等。

② 参见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戴海斌：《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中方“全权”问题》，《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韩策：《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东南督抚：辛丑议和与清廷“三角政治”》，《国家人文历史》2016 年第 11 期；王刚：《从枢臣、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的互动看〈辛丑条约〉的形成》，《历史教学》2017 年第 22 期；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③ 韩策《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之所以冠以“余波”之名，系因乡试展期论争中东南督抚的联合是“互保”格局的延续，并非单纯对“东南互保”这一事件后续的考察。

④ 参见戴海斌：《余联沅：从“铁面御史”到“洋务干员”——上海道研究的一个个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⑤ 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年）对《日本外交文书・北清事变》作了选译，但偏重军事布防内容，庚子西狩、议和等部分的内容均未有译文面世。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2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8 页。

⑦《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盛宣怀档案》，香港中文大学藏，档案号：sxh11-0046。

⑧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55 页。

⑨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卷，第 252 页。

此非空言，听闻沪道即将交卸，一时舆论哗然，“各国领事均请南洋留余”，① 两江督署“电牍纷沓”，英领事直谓程仪洛“嫉视西人，各国官商均不愿与共事”，②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曾专电刘坤一，盛赞余联沅在沪办理机宜得当，“与各国领事往来，无不和衷共济，与本总领事尤甚”，表达了借刘坤一之力留住余氏的愿望，③ 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亦认为“沪渎不可一日无观察”，电商刘坤一以大局为念，求其奏留。④ 日人的报告中还明确提到，除了各国领事的反对，“本国官民中亦无一人乐见程仪洛履任”，当地各省会馆及部分商董甚至召开大会并联署请求暂留现任道台余联沅，公开反对程仪洛就职，⑤ 更有绅商感怀德政，特制“澄清江海”匾额及万民伞一顶赠与余联沅。⑥ 见中外官民一致反对，刘坤一也认为当此变局之际，沪道一席“诚不宜动”，遂告以尚未接到部文，待奉旨之后再酌办答复，⑦ 暂将此事冷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观察揭露此事的另一个面相。八月二十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更换上海道的消息报告给外相青木周藏，电文如下：

> 上海海关道余氏升任江西按察使，保守派人物程仪洛将继任海关道。此项任命源于鹿传霖之谏言，并得端郡王之支持。若确实，或可猜测此为南方诸省其他高级官员被罢免之先声。上属机密。⑧

小田切自光绪二十三年担任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起，便利用其丰富的人脉资源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情报，并频繁向外务省汇报。其在华人际网络中不乏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文廷式、郑孝胥等大吏名流，是个十足的“中国通”，⑨ 李鸿章曾批其“专喜刺探”，“串通东南，造谣生事”，⑩ 其影响可见一斑。在小田切看来，这次出人意料的人事变动是接下来东南地区的主政者“大换血”的前奏，如此则辛苦换来的互保之局行将不保，实堪忧虑。事实上，当时正值力主排外的端王载漪新入军机，⑪ 南方中外人士中普遍存在与小田切类似的不安情绪。与盛宣怀交往密切的乡人费念慈曾告与盛氏，称“此后恐有易置东南将帅之事，江左半壁亦极可危”，⑫ 德国驻汉口领事甚至专程拜谒张之洞询问是否“长江两制台有调动”，若此事为实，德国水师愿意入江相助。⑬ 这样的猜测一直持续到十月，以至于清廷被迫辟谣，称“现在东南大局正赖搘持，款议尤赖两督妥为参酌，朝廷倚畀方殷，岂有撤任之理？”⑭ 日本对上海道更替的解读也基本循此理路：如果此时开明官员被尽数罢免，而多代之以端王党羽，那么外国人在南方的稳定利益必然受损。

---

①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一日），《盛宣怀档案》，香港中文大学藏，档案号：sxh01-0069。

②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卷，第339页。

③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卷，第252页。

④ 《上海海关道更迭ノ件・附记3・机密第一一〇号》（1900年10月3日接受），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7年，第134页。

⑤ 《上海海关道更任ニ关シ续报ノ件》（1900年11月16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181页。

⑥ 《上海官场纪事》，《申报》，1901年1月11日，第2版。

⑦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卷，第256页。

⑧ 《上海海关道更迭ノ件》（1900年9月21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132页。

⑨ 对于小田切在华的外交活动，可参考戴海斌：《义和团事变中的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易惠莉：《晚清日本外交官在华的多方活动（1898-1901）》，《近代中国》第22辑，2012年。

⑩ 《李鸿章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日），《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SD056435。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288页。

⑫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卷，第256页。

⑬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97页。

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7页。

（二）程仪洛其人

在得知程仪洛将继任上海道后，小田切对其作了进一步调查：

> 其人为浙江省杭州府人，系保守人物，且与目下随扈行在之江苏巡抚鹿传霖交往匪浅。此次北方匪徒骚乱，传霖奉命率军，入京勤王，程氏则担负军队后勤补给之责，近来常驻扬州。此次能补余道之缺，荣升港口要职，据清国人之言，主要得益于鹿传霖之推举，且有端郡王之支持。

电报中提到程仪洛背靠两棵“大树”，其中之一的端王载漪本是公认的“排外”者，在己亥建储及义和团事件中屡屡掀起风浪，而作为荐主及上司的江苏巡抚鹿传霖自然同气连枝，如此一来，程氏便成了“排外”小集团在上海的代理人。小田切认为“若以如此人物担任本港道台要职，是对本港秩序最大的危害，甚至难保在南方不会有衅端之虞”，于是驻沪外国领事集体面谒余联沅，产生了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领事们询问余联沅在朝廷汲汲仇外的风气下，为何不愿消灭外国人，余氏答以“即便奉到上谕，不得已而为之，也会为涂炭百万生灵感到痛苦”。领事们随即作出一个假设：若使程仪洛回答相同的问题，其一定会叫嚣着“哪有什么生灵”的。[①] 可见此时在外人心目中，一旦被打上“保守”的烙印，与之伴随的一定是视洋人如禽兽的邪恶形象。

那么程仪洛究竟是何许人也？尽管其仕宦活动在清末报纸等资料中并不少见，但真正与其生平相关的直接记录确属寥寥，其本人亦未留下太多笔墨，因此只能透过零星材料构筑其人履迹。有野史称程氏曾任职台谏，尝有“四大金刚八小鬼”之谓：

> 光绪初，台谏以敢言名于时者十二人，滑稽者有四大金刚、八小鬼之称。四金刚之一曰何金寿。八小鬼之二曰程仪洛，曰宜子望。而三人皆先后守扬州，何以正直称，程以清厉著，宜以严峻名。[②]

然笔者目前尚未见其曾任台谏官之确证。《履历档》中仅存的一条有关程仪洛的记录，载于光绪十三年，其人当年为四十五岁，若记录属实，则其生年应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其籍隶浙江山阴县，字雨亭，原籍安徽，由增生中试，光绪二年中举，次年进士及第，签分吏部行走，后报捐知府，分发江苏试用。光绪七年任扬州知府，“因运河两届安澜出力”，擢升道员，十二年“因筹解西征协饷出力”，加二品顶戴，后复任扬州知府，又报海防捐，成为江苏候补道员。[③]

在江苏任职期间，程仪洛与刘坤一配合得力，颇受其赏识。刘氏称其“秉性端方，学识优裕”，“名利去就，莫不以礼自处，以义自裁，虽在困穷，未尝稍涉苟且”，赞其为“道员中难得之才”，上奏力保。[④]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对程仪洛也青眼有加，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上奏荐举的十六员中，程仪洛占有一席。[⑤] 张之洞返鄂后还曾以江南厘金积弊已深，藩司事繁，不及整顿，请交程氏专办，[⑥]“而岘帅（刘坤一）不以为然”，郑孝胥也认为“南皮（张之洞）真恶作剧矣”。[⑦] 果不其然，程仪洛的顶头上司刘坤一后来上奏，虽称赞程氏“究心时务，办事精详”，但并未同意张之洞之建言，而是派其接办皖南

---

① 《上海海关道更迭ノ件・附记 1・机密第一〇九号》（1900 年 9 月 26 日接收），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32–133 页。

②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4 册，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809–1810 页。

③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4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574 页。

④ 《刘坤一集》第 2 册，岳麓书社，2018 年，第 238 页。

⑤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40 页。

⑥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087–1088 页。

⑦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 1 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51 页。

茶厘，[①]这恰恰证明刘张意见相左，而对江南厘金责有攸归的刘坤一不欲张之洞插手两江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上奏之时，程仪洛恰在武汉，且曾拜会张之洞、郑孝胥等人。[②]由此可以推论张之洞保举程仪洛专办厘金一事与程氏的造访大有关系，且二人之相交最早可追溯至张氏署理江督之时。

时至戊戌年，对程仪洛越发看重的张之洞，更是奏荐其与王秉恩共同会办新设的汉口商务局。[③]然看重归看重，此时张之洞对程仪洛还远谈不上完全信任。程氏在江苏经营多年，且一度与刘坤一配合默契，张之洞尚难以同一阵营视之，所以当变法进入风声鹤唳阶段，在听闻"两江派程仪洛赴鄂密查事件"之时，张氏极为紧张，慌忙发电给上海的赵凤昌，寻问程氏此行"所查何事？是否奉旨？"[④]实则并无其事。不过这种细微的隔阂在程仪洛到湖北履任之后，随着与张之洞工作联系的日益密切，亦逐渐消泯。且张之洞幕府向称文墨之薮，程仪洛本有文才，自其入鄂后便与郑孝胥、沈曾植、梁鼎芬等张氏幕友多有交往，引为同侪，有论者更将程氏视作"宋诗派"文人群体的一员，[⑤]人际网络的变动使其政治倾向亦渐趋转移。此数年间的办事经历使他颇得赞誉，王文韶便曾言其"东南诸大老交相论荐，一时无出其右者"。[⑥]

以笔者管见，程仪洛受知于鹿传霖，亦很可能与张之洞大有干系，盖因鹿传霖抵任江苏系光绪二十五年，[⑦]此前则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广东，与常年在江苏、湖北两地的程氏鲜有交集。或是由于程仪洛熟稔两江事宜，鹿传霖于庚子年初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后，便请张之洞派其返苏"详询一切"，[⑧]据《郑孝胥日记》可知，程氏曾在该年的三月至闰八月初间离汉赴宁，[⑨]必是应鹿氏之请，鹿、程二人之密切关系，亦发端于此。

程仪洛其人的政治倾向保守与否，目前可见资料似不足征。观其仕途履历，可以断定的是，其在江苏时是鹿传霖的重要臂助，而在湖北办差的经历又使其与张之洞一系颇为热络。然而外人忽视了程氏与"开明派"大员张之洞的交谊，只关注其与鹿传霖的联系。前文已言及，庚子年其曾离汉五月有余，范围上囊括了鹿传霖起兵勤王之前后经历，则日本人探听到的程氏在扬州为鹿氏效力的消息未必失真。要而言之，外人将程仪洛目为保守排外，其"保护伞"鹿传霖则更是不遑多让。在之后的情报中，日方毫不掩饰将鹿、程二人斥为"臭味相投"，[⑩]并对之后鹿传霖的超常拔擢及日益扩大的影响倍感焦虑。

---

① 《刘坤一集》第2册，第499-500页。

② 张之洞上奏次日，程仪洛曾拜访郑孝胥，与张之洞对程氏"学识端严，清介绝俗，才长心细，坚定有为"的优良评价不同，郑孝胥对其第一印象并不甚佳，认为其"虽硁硁自好，而识量甚浅，非干济之才也"。见《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552页。

③ 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上奏："查有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端廉切实，才力精强，商务综核尤所擅长。此次另片委调之江苏候补道程仪洛，廉正核实，不辞劳怨。拟委令该两员会同总理其事。"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29页。

④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⑤ 杨萌芽：《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动年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按，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为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且均与张之洞关系匪浅。

⑥ 袁英光等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009页。

⑦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第201页。

⑧ "程道拟详询一切，鄙人系权篆，不敢遽定办何事。"参见《张之洞收江宁鹿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79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551页。

⑨ "程雨亭来辞行，赴南京。"《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3页；"程雨亭由江裕来。"《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9页。

⑩ 《上海海关道更迭ノ件・附记3・机密第一一〇号》（1900年10月3日接受），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134页。

二、“事关东南大局”：高层角力下的中外筹划

（一）日人观察中的鹿氏擅权与刘鹿不谐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鹿传霖入枢的消息传来，小田切给新任外相加藤高明发去了关于此事的观察报告，对于鹿氏之蒙恩，报告中这样说道：

> 其人之荣升实为例所罕见，受此殊恩，固系得自刚毅等人推举，然近来有一论调指出，前此銮驾初抵太原时，受命随行之大臣大半因道路梗阻而未能及时赶赴行在，而彼时鹿氏正在山东北部养病，听闻京师阽危，便即刻动身赴晋，成为最早抵达太原府行在服侍慈躬之人，太后因而十分欣慰，遂有前述之殊荣。①

关于鹿传霖势力之扩张，报告中举出数例，除慈禧在其坚决主张下决议继续西迁外，还有此时湖北巡抚于荫霖与河南巡抚裕长的职位互调。小田切认为于荫霖抚豫属于升迁，而裕长赴鄂则系降职，而于氏得此机遇则全因鹿传霖的推举。此外，小田切的报告突出了一个重点，即日益明朗化的刘坤一与鹿传霖之间的矛盾。

小田切指出，刘鹿之间的矛盾主要呈现于三端：其一为鹿氏在东南互保问题上的极力反对；其二为“久受刘坤一恩惠的、在淮安从事官盐专卖的江苏海州分司运判徐绍垣”因贩卖私盐而被弹劾，继而遭革职发配，背后主使乃是鹿氏；其三则为上海道易任一事，此事遂开始被日本纳入“刘鹿冲突”的考察框架中。小田切注意到，此时清廷的军机大臣中“端郡王在太原，启秀在北京，荣禄尚在途中，而刚毅则已身死，因此随扈军机仅王文韶、鹿传霖、赵舒翘等人，而王氏已经垂垂老矣，赵氏亦不及往日受宠，辅翼皇室、赞襄政事、掌握权柄的，仅鹿氏一人”，而由这样一位被视作“顽固守旧”的人物执掌枢垣，很可能会影响议和的顺利进行，“亦难保东南各省不会陷入溃乱糜烂难以收拾的局面”，② 故而“刘鹿冲突”的潜台词便演化为温和派与守旧派的冲突，日本的密切关注则体现了外人对守旧派掌权的厌恶情绪。

后来张人骏由山东布政使升调漕运总督，机敏的小田切又打探到张氏乃鹿传霖之亲戚，“足见鹿氏势力日盛”。③“湖北某官员”处亦有政情鳞爪相供：

> 刘总督心中堪当中央及地方重任的人有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大理寺少卿盛宣怀，驻英美俄三国公使杨儒、罗丰禄、伍廷芳，若以彼等料理国政，可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之效。然而如今如礼部尚书鹿传霖之流，负恃君宠，独断朝政，即便令奎俊、张之洞入枢，恐怕亦难有一展抱负之机会。④

上述官场中人的议论更加剧了小田切对鹿传霖的负面印象，而这种恶感并非其所独有。时任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亦曾发表类似言论，认为王文韶、岑春煊等人与张之洞相似，是

---

① 《鹿传霖ノ拔擢并湖北河南两巡抚更迭ノ件》（1900 年 10 月 24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55 页。

② 《鹿传霖ノ拔擢并湖北河南两巡抚更迭ノ件》（1900 年 10 月 24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55–157 页。

③ 《西安ニ于テ颁布セラレタル各种上谕写进达ノ件·附记 1》（1900 年 12 月 3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70 页。按，笔者未查到张人骏与鹿传霖有何亲戚关系，疑为讹传。

④ 《湖广四川安徽各督抚异动风说ノ件》（1900 年 11 月 9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74 页。按，关于张之洞入枢，似倡自驻日公使李盛铎，但被张之洞果断拒绝。“闻尊意欲荐鄙人入政府，骇极……千万叩头求罢此议”，“岘帅与鄙人岂能离长江，即使各国认保长江约，假如不能自保奈何？”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8339 页。

“最可靠的”人物，而赵舒翘、鹿传霖则会危害清国社稷，[①] 足见此时鹿传霖在日方眼中俨然已成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而关于程仪洛是鹿传霖亲信的事实，小田切后来又从前任上海道、深受刘坤一信任的蔡钧处得到证实。因此，在以小田切为代表的部分外国人眼中，上海道的更动已不仅是一次单纯的人事变动，而是鹿传霖倚势打击刘坤一的系列行动中的一环，“若任由其权势增长，则东南地区的安全就难以保证”，程仪洛的任命“一方面关乎当地的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又关乎南方督抚的施政及命运”，尤其是在庚子年中外关系的敏感时刻，外人理解的这场“温和派”与“守旧派”的冲突，无疑会影响其既得利益，于是小田切决心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感觉有必要在与他国领事协商的基础上，协助刘总督，压制鹿氏的专横。”[②]

外人的观察不为无见。一方面，此时的鹿氏确实圣眷正隆，在中枢气焰颇盛，常给人“卞急乖张”之感。根据户部主事李哲濬的西安见闻，鹿传霖亟思排挤王文韶，夏震武奏章颇有劾及王氏的内容，“闻鹿颇暗中助之”。[③] 另一方面，大吏之间的繁复关系亦确是庚子年纷乱政局的又一图景，论者已洞悉当时清廷内部的“多角政治”，指出西安军机处、北京全权大臣、东南督抚、驻外公使诸方之间暗含博弈，不过主旨更侧重于议和层面的探讨。[④] 实则在议和之外，枢臣与东南督抚之间、东南督抚内部之间亦不乏暗自较量。

（二）合作与斗争并行：东南督抚间的微妙关系

首先，刘坤一与鹿传霖的貌合神离，是可以通过史料证实的。在议定“东南互保”之际，身为苏抚的鹿传霖就颇不谓然，[⑤] 西行随扈时，其又专折具奏，认为洋人要求回銮之后再开议乃“彼族之狡谋”，是欲将朝鲜故事行于中国，为今之计不如避地迁都，而“秦中自古帝王州，河山四塞，北有山西、直隶，南有巴蜀、荆楚，东有河南、山东，西有甘肃、新疆”，故为扼险固守之佳地，极力主张迁都西安，卧薪尝胆，以图中兴，[⑥] 大力促成两宫西迁长安，颇为时论不惬，被目之以“诡谋长顽，焰荡和局”，[⑦] 亦大忤反对继续西迁的刘坤一等人。刘坤一、李鸿章等皆认为两宫在京远比继续西逃安全得多，一意拖延，则“深恐各国以自弃京城为言，变其宗旨，分占要地，开议无期，大局不可收拾”，[⑧] 对于清廷拒不回銮而坚持西迁的态度十分忧虑。事实上，外人对鹿传霖的观感不佳，也多与上述事件勾连，加之鹿氏任苏抚时曾有奉命监视改革者和新闻界的传闻，[⑨] 且庚子年又率兵北上勤王，在在令其粘连“顽固排外”的标签，以至于外人多将其视作“刚毅第二”（The Second Kang Yi）。[⑩]

---

① 《毓贤所在及董福祥处罚困难事情报告ノ件》（1900 年 11 月 12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76 页。

② 《上海海关道更任ニ关シ续报ノ件》（1900 年 11 月 16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81−182 页。

③ 《有关西安见闻》（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SD056022。按，夏震武（1854−1930）时为工部主事，随扈两宫，曾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1 年 1 月 13 日）上《枢臣庇逆怀奸请旨立赐处分以除内间而保宗社折》，直斥王文韶为“倾邪小人，乘时窃位，庇逆罔上，蓄心积虑，以章惇、秦桧自处”，有趣的是，折中最后用了一整段谈及鹿传霖阻止其上书事，笔者以为夏氏如此不厌其烦，看似批驳鹿氏，其实是在力证弹章并非鹿氏鼓动，以去其嫌疑。见王波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震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76−278 页。

④ 戴海斌：《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中方全权问题》，《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⑤ “余道接滋帅函及程道、许道所述，颇以东南保护为不然。”见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8115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117 辑，中华书局，1996 年，第 840−841 页。

⑦ 中国历史研究社主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 年，第 130 页。

⑧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8333 页。

⑨ “Culture and Lif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5th Mar, 1900, p.3.

⑩ “The Successor og Kang Y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9th May, 1901, p.4. 按，当时确有传闻称鹿传霖是“刚毅之代表”，“刚死去，鹿代为顽固党之首领”（《鹿传霖之特质》，《新民丛报》汇编，1903 年，第 872 页），然鹿传霖与刚毅之间的关系，还需更多史料佐证，不可将鹿遽断为刚党。

此外，刘坤一“颇惧滋帅（指鹿传霖）入枢，与彼为难”，曾电商盛宣怀，嘱其转恳李鸿章设法斡旋。[①] 此事系与上海道人事变动一事并陈，“事关东南大局”亦并非单指鹿传霖入枢事，由是可知鹿氏入枢与沪道易手乃是紧密相连之二事，在刘坤一看来均为鹿氏要染指东南的表征。耐人寻味的是，刘坤一对二人生隙之由深感疑惑，因二人起初关系极佳，却不知为何鹿氏于其进京之际突然发难，以署理江督的名义参奏淮北盐务“积弊太深，官商通同蒙混”，攻讦前文述及的刘氏亲信海州分司运判徐绍垣“朋比为奸、串通分肥”，[②] 徐因之被发往军台效力，二人不睦由此而生。之后鹿氏更是对徐绍垣穷追不舍，迫使其改发新疆并勒令其补交亏款，[③] 由是二人嫌隙弥深。

其实在此之前的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至八月间，刚毅以钦差之名“前往江南一带查办事件”对刘坤一带来不小的冲击。[④] 此行虽专为清查江南财政问题，背后却更有一层警示刘坤一的暗义：戊戌政变后，慈禧、端王载漪等密谋废立，然刘氏却力持反对之见，由是大忤载漪、刚毅等人，亦引发慈禧不快。之后山东巡抚毓贤奏参刘坤一“庸懦昏聩”，且称江南厘金积弊甚深，“半归中饱”，遂致刘氏遭受慈禧申饬。[⑤] 继而刚毅南下，除整顿关厘、清查赋税外，另以“节流”为名对新式学堂、商务局等洋务事业大加裁撤，对以沈敦和为首的一批颇受刘坤一器重的洋务人才亦不吝打压，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亦受波及。刚毅北返之后，刘坤一随即奉命入京陛见，一时兵权离手，而江督则交由鹿传霖署理，于是便有了前述鹿氏弹劾淮北盐政一事，此举于刘坤一而言，不啻为雪上加霜。直到庚子年四月，刘坤一才回任两江，而更换上海道一事则发生在四个月后，前此受挫可谓历历在目，刘氏自不愿鹿传霖门人掌握上海道这一集海关税务与对外交涉等重任于一身的要缺，同样遭受刚毅打击的盛宣怀，自然所见略同。

其实不唯刘、鹿之间关系微妙，刘坤一与张之洞的暗自博弈同样耐人寻味。尽管二人在互保一事上鼎力合作，于推动议和诸端亦有赞襄之力，却难称处处相谐，譬如在面对回銮议题时，张之洞便站在刘坤一的反面，认为“回銮万不可行，幸陕万不能阻”，[⑥] 对此刘氏只好以全权、疆吏各有分际为由，表示“未敢再言”，[⑦] 实际未必没有敲打张氏的隐衷。而在反对回銮、主张西迁的问题上与张氏通同一气的鹿传霖，又恰是其姐夫，是以“南皮定兴，实为一气”，[⑧] 二人本就过从甚密，此际鹿传霖又随扈行在，深蒙慈眷，不免成为张之洞探听行在政情的重要“坐探”，是为疆吏与枢臣间建立稳固且持久私人关系的典型一例。尽管很难断定张、鹿二人已经结为阵营，但其密切关联难免使与鹿传霖不洽的刘坤一心存芥蒂。更巧的是，身为鹿门中人的新任沪道程仪洛与张之洞也脉脉相通，这自然使视东南为禁脔的刘坤一感到威胁。透过下文的论述，不难发现对于上海道事件的措置，基本是刘坤一与盛宣怀、李鸿章甚至荣禄居间调处，而此际大小事件皆有与闻的张之洞却不见其踪，这一避开了张之洞的“单线联系”，着实耐人寻味，足以证明刘氏对张氏的提防。可见主导“东南互保”的两位高官在亲密合作之余，腹中仍不免各有筹

①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档案》，香港中文大学藏，档案号：sxh01-0069。按，盛宣怀此禀颇值一谈，其中关于上海道台更易事的叙述是以其第一人称的口吻，而关于鹿传霖入枢一事则是以“岘帅来函”的形式转为刘坤一的意见，且刘坤一提出了通过李鸿章、荣禄来处理此事（指鹿氏入枢）的解决方案；而揆诸刘坤一原函则不然，原函中本就有刘坤一对上海道更易事的看法，且通过李鸿章、荣禄协助斡旋的方案针对的是上海道事件，而非鹿氏入枢事件。见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册，第339页。可以推断盛宣怀在向李鸿章转述时，存在对刘坤一原函的改动。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82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323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5册，第108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5册，第95页。

⑥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19页。

⑦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册，第299页。

⑧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95页。

谋，这恰是庚子事变的多歧之貌。

（三）刘、盛、李等人的应对方案

对于沪道的人事变动，刘坤一一直未敢等闲视之，然而小田切联合各国领事施压的干预意图却是其深以为忌的。刘坤一起初设想，在接到部咨后，再上奏“密陈”，却又怕“所陈阻隔”，“势必启外人干预黜陟之端”，为了避免外人干涉人事任免，刘氏希望通过盛宣怀密陈李鸿章，请其商请荣禄，使荣抵达行在时与两宫独对。① 盛氏虽电告李鸿章，② 然并未得及时回复，至于荣禄，则已径赴西安，并未与李氏会面，盛氏猜测李氏“未便以钧意转呈，尤未能平空越俎”。此时英日等国又提出另委他人以代程仪洛的提议，这难免又给刘氏与盛氏造成外人执黜陟之柄的恐惧。为此，盛宣怀提出了如下建议：

> 顷闻英、日领事已电禀其公使转致傅相，或可据公使之言，径行电奏，或仍电请台端入奏，似亦可昭然于非一人之爱憎矣。余道有鉴于和甫，故有速去之请。管见，目前更新不及留旧。措词较易。与各国互立保护长江各省之约，系余道一手经理。闰八月二十日方且有该督等谨守封疆，接济行在之旨，和局未定，自不能遽易生手，即如英总领事虽换璧利南，而约内公事，仍留霍必澜在沪办理，事同一律。沪道则又未可分地方交涉为二事也。
>
> 程道长于吏治，若先行位置淮扬一席，似最相宜，沈道熟谙洋务，六月间曾奉委来沪会商立约，与各领事颇能联络，奏留余道，亦是暂局，若我公为地择人，他日即以沈道调署调补，当可胜任。刍荛之见，以备采择。
>
> 时局如斯，彼人之执拗，固非所宜，但关系大局之事，似亦难于迁就。公大含细入，令人钦佩无已，恒此举恐不能不由外入告，荣相与定兴甚洽，约计日内将入潼关，或请电商荣相，尤为妥贴，再肃密复，敬叩钧安。名心谨又肃。
>
> 正在封函间，接奉傅相密电，抄呈台览，此事虽经各使面提，度亦未能设法斡旋，如尊处密陈，或将应留之意，声明与傅相电商，意见相同，似无不可。③

盛宣怀的意见至少表明以下几点：首先，外国领事为抵制程仪洛就任，已经直接与李鸿章电报联系。李鸿章九月初四日曾有一复电致盛宣怀，言“余道应奏留，程有他缺调署，鹿亦无辞，希转岘帅酌办”，④ 应该就是盛氏所说的在封函之际收到的“傅相密电”，由“转岘帅酌办”可知李鸿章虽不想与此事牵涉太深，但亦有定见，同样主张余联沅留任，并给程仪洛安排其他官缺，以塞鹿传霖之口；其次，盛宣怀通过分析就任者的才干优劣，建议程仪洛专办淮扬吏治，而沪道则暂以余联沅留任，日后再以熟悉洋务的“沈道”即沈瑜庆代之。这一点并非盛氏一个人的想法，费念慈亦认为“雨亭精密，然不及晋珊”。⑤ 盛宣怀提出相关事宜可以电商与鹿传霖交好的荣禄，使荣禄抵达西安后从中斡旋，或由刘坤一自行密陈，并声明是与李鸿章电商且意见相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余联沅的态度：“有鉴于和甫，有速去之请”，和甫即其前任沪道蔡钧，蔡氏在一年前因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大忤外人，被去职，此时眼见此席再度引发交涉，余联沅实在难安其位，只求速离漩涡中心。此外，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中心人物的余氏，对于自身官运尚不如盛宣怀明了，直到闰八月，仍不知自己是外放山西臬司抑或江西臬司，⑥ 殊为尴尬，亦可知此事虽因其而起，而因应权柄则全操自他人。

其实若必去余联沅，对于新任沪道的人选，外人也有自己的想法。譬如小田切就曾经建议

①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册，第 339 页。

②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一日），《盛宣怀档案》，香港中文大学藏，档案号：sxh01-0069。

③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册，第 339-340 页。

④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7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361 页。

⑤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册，第 256 页。

⑥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盛宣怀档案》，香港中文大学藏，档案号：sxh68-0106。

刘坤一派遣前任沪道蔡钧重掌道篆，若不行，则以江苏候补道、时任南京银元局总办的刘思训代之，因此人与小田切交好，且为人廉正，深受刘坤一信任。蔡钧与刘坤一确实关系密切，刘氏亦曾与人言其在沪道任上乃“人地相宜”，深为其被排挤去职一事感到惋惜。[①] 孰料此电报送达刘坤一处之前，便已接到袁树勋确任沪道的消息。[②]

三、程去袁来：上海道更易事件之终局

自八月接到迁转上谕后，受制于中外合力，余联沅始终未离开上海。之后行在传来新的任命：余氏改任湖南布政使，旋又署理浙江巡抚，江西按察使由柯逢时代之，程仪洛则改任两淮盐运使，[③] 上海道台一职终于花落刚刚简授湖北荆宜施道台的袁树勋之手。[④] 何以有此了局，由于史料的缺失，已难窥个中全貌。但是从小田切向加藤高明的汇报中，可以捕捉一些蛛丝马迹。

小田切称其在与蔡钧谈话中得知，刘坤一在获悉程仪洛将补授上海道后，便上奏请求将程氏转任他职；同时在小田切的鼓励下，刘氏还设法将此情传达给鹿传霖，使其将程道转往他处。鹿传霖很有可能是考虑到若强行令程氏赴任，“会引发当地外国领事的联合反抗运动”，所以不得已而依议。[⑤] 质言之，刘坤一应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面受前述盛宣怀的建议及李鸿章“密电”的鼓动，奏留余联沅，并建议由程仪洛补缺“淮扬一席”，且“声明与傅相电商，意见相同”；一面受小田切万寿之助启发，以沪道所用非人极易引发外国交涉为由恫吓鹿传霖，最终导致程氏赴任的计划泡汤。程氏转而主管两淮盐政，恰与盛宣怀等人为其规划的去向接近，亦可证明盛、李的建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事了结之后，张氏曾修书鹿传霖：“程雨亭擢盐鹾可谓用当其才。盖其人弟所深知，作上海道则不足，作运司则有余也。”[⑥] 此言足证程仪洛迁转的个中机宜确操诸鹿氏之手，刘坤一对鹿传霖染指东南的猜测基本坐实。同时张之洞对程氏才干的品评也透露出区别于权力较量的另一层维度：外人出于对顽固派人物的抵触，多以政治倾向对程氏横加臧否，而官场中人则通常还要从利害得失及其才能胜任与否的角度进行考量。费念慈所言“雨亭精密，然不及晋珊”，[⑦] 盛宣怀所言“程道长于吏治”，[⑧] 皆循此尺度。

通过袁树勋的背景，亦能略窥内情。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晚年自号抑戒老人，湖南湘潭人。太平军起事时，入湘军塔齐布营中，屡有战功，保举而为从九品，指分江苏，后因投效陕甘老湘营得保知县，加捐同知衔。自光绪三年起，历任江苏高淳、铜山、南汇知县，因表现卓异，十五年调补上海县知县，后因在海运、捉拿会匪等事上出力甚多，二十一年分发江西，后以知府补用，庚子事变前又擢天津知府。袁树勋起自湘军，而其进阶又多得湘军大老

---

① 《刘坤一集》第 5 册，第 188 页。

② 《新任上海海关道袁树勋经历报告ノ件》（1900 年 11 月 23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84 页。

③ 九月二十六日，行在下诏：“湖南布政使著余联沅补授，钦此。”次日，柯逢时补授江西按察使，“所遗两淮盐运使员缺著程仪洛补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26 册，第 390、393 页。十二月初七日，余联沅被命署理浙江巡抚，“恽祖翼著俟余联沅到浙后再行交卸。”见《本馆接奉电音》，《申报》，1901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④ 九月二十四日，袁树勋补授湖北荆宜施道员：“湖北荆宜施道员缺著袁树勋补授，所遗直隶天津府知府员缺著凌福彭补授，钦此。”九月二十八日下诏：“江苏苏松太道员缺著袁树勋调补，湖北荆宜施道员缺著濮子潼补授，钦此。”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26 册，第 382、395 页。

⑤ 《上海海关道更任ニ关シ续报ノ件》（1900 年 11 月 16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81–182 页。

⑥ 《张文襄公全集》卷 217，中国书店，1990 年，第 23 页。

⑦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册，第 256 页。

⑧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册，第 339 页。

提携，曾国荃称其“精明干练，有守有为”，[①] 刘坤一称其“通达治体，洞悉物情”，[②]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袁树勋带有十分鲜明的湘系标签，与刘坤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另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即袁氏同时还是荣禄的门生。[③] 由此可见此事得解的关键仍在荣禄，盛宣怀建议的由荣禄向鹿传霖通气的路线很可能得以落实，最终的继任者是荣禄与刘坤一共同认可的，进而可证在戊戌政变后颇受载漪、载澜、刚毅等人压制的荣、刘二人，此际又由衰转盛。另外，袁树勋在西行途中表现突出，有“一哭受知孝钦后”的传闻：

> 两宫既避联军之乱，狩于西安，袁以某省候补知府，率五营勤王，召见。孝钦后谕毕，袁不发一言，惟叩头大哭。后谓德宗曰：“知府，末秩耳，乃竟有此忠君爱国之心，真不可多得。”不久，即简为某省道员，嗣调苏松太道，擢某省按察使，转顺天府尹，迁民政部左侍郎，出为山东巡抚，扬历京外，遂至两广总督。[④]

传闻绘声绘色，却难免疏漏，譬如袁树勋当时并非某省候补知府，而是正任天津知府。但不可否认的是，袁氏之发迹确实始自庚子年，出任上海道更是极佳的跳板。根据日本的考察，袁树勋曾在赴任天津知府之际从江西率领两千勤王兵北上，[⑤] 陈三立亦曾言袁氏于庚子年“随援师扺行在召对”。[⑥] 故此，其因功得此肥缺亦属分所当为。且其曾有在上海任职的经历，对沪上事务相对熟悉，接手较易，想必也是得缺的重要因素。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袁树勋抵沪，[⑦] 次日余联沅完成交卸，[⑧] 于十二月十八日赶赴新任，[⑨] 离开了带给他无限荣耀的上海。回顾“上海道更易事件”，余联沅由上海道台而至江西臬司，再至湖南藩司，袁树勋由天津知府而至湖北荆宜施道，再至上海道，程仪洛由江苏候补道而至上海道，再至两淮盐运使，此三人的生活几无交集，却冥冥之中命运相连，在庚子年的短短三个月间同享了一番剧烈的宦海浮沉。

余论

盛宣怀将庚子年的诡谲局面总结为“内政外交实相表里”，[⑩] 此语甚得之，上海道更易事件便是透视此间政情的典型案例。

自八月下旬行在下诏，以程仪洛补上海道，而广受内外赞誉的“互保”功臣余联沅改任江西按察使后，一场围绕着余氏去留与何人继任的沪道人事风波就此开场。对于沪上列强势力而言，维持东南地区的安稳现状最能维护其在华利益，而于保全东南有促成之功的余联沅无疑最得彼等垂青；相反，拟继任的程仪洛则是“保守派”大吏鹿传霖的“党羽”，自然不受外人待见，且沪道更动多被视作江南政坛变动之先声，由是则外人深恐开明官员尽黜，殃及自身，于是纷纷致电刘坤一、盛宣怀，希望力阻程仪洛赴任。而中国官绅亦颇有“感怀德政”之意，不愿余联沅离开上海。

---

① 《曾国荃集》第 4 册，岳麓书社，2008 年，第 435 页。

② 《刘坤一集》第 2 册，第 564 页。

③ 参见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 年，第 194–196 页。

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1 册，第 334 页。

⑤ 《新任上海海关道袁树勋经历报告ノ件》（1900 年 11 月 23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二·北清事变中》，第 184 页。

⑥ 陈三立：《清故署两广总督山东巡抚袁公神道碑》，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 15，文海出版社，1980 年，第 214 页。

⑦ 《上海官场纪事》，《申报》，1901 年 1 月 11 日，第 2 版。

⑧ 《颂声交作》，《申报》，1901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⑨ “Latest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7th Feb, 1901, p.3.

⑩ 《公务来报》（庚子年，具体时间未详），《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SD003656。

“余去程继”的情形对于江督刘坤一而言，除了中外交涉的压力外，尚须纳入戊戌之后两江局势的视域中进行审视：面对刚毅的敲打及鹿传霖的釜底抽薪，刘坤一深受其苦。程仪洛既位列鹿门，若使其莅沪掌篆，无异于放任鹿传霖继续染指东南。为防掣肘，刘坤一与盛宣怀多加筹议，并得到李鸿章的引导：奏留余联沅，并请将程仪洛署以他缺。此外，刘氏还受小田切万寿之助启发，以引发外国不满为由恫吓鹿传霖。最终的处置结果是，程仪洛改任两淮盐运使，余联沅改任湖南布政使，上海道台一缺则由既有湘军背景，又属荣禄门生的袁树勋补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了荣、刘等开明官员的地位在庚子以后政坛中的回暖。原先鹿传霖着力弹劾的淮北盐政，改由程仪洛执掌，则看似无心插柳却又暗合情理。这一终局实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共赢”之选。

上海道更易事件虽是在中外合力的推动下得以解决，然在合力的背后亦隐含角力的面相。须知刘坤一积极应对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保证官场黜陟之权操之在我，然而程仪洛去职的结果却正中外人下怀，实则是以一种“权操于我”的外壳实现了“权操于彼”，这正是庚子年开启的吊诡之门：外人完全可借清廷官僚之手实现对人事任免的干预，除了通过“惩凶”迫使清廷刷新政坛高层外，还将触手伸向了以上海道台为代表的官场中层。合力也好，角力也罢，均是内政外交相表里的实现形式。已有论者注意到庚子之后外国势力变本加厉的“侵犯内政”现象，通过审视上海道台事件，或可对当时内外交织的政局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感悟。

这一事件将多名清廷大吏卷入其中。前文已论及刘坤一、鹿传霖二人的分道扬镳，但是若据此即断定鹿氏乃“守旧”之人，是“一未死之刚毅”,① 则大谬不然。早在川督任上时，鉴于旧学弊病，鹿氏便曾在四川兴办中国西部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四川中西学堂，入枢后亦多躬身参与新政及涉外事务，其政治营垒实难一言以蔽之。② 其为人亦算刚直，时人谓其“一事不苟，一语不欺”，“公而忘私”,③ 绝非尸位素餐者可比。事实上即便是普遍不喜鹿传霖的外人中，亦有为其辩白者，称其在川督任上大搞西化，且对洋人友好，绝非仇外之人，并认为其北上勤王之举与阻止两宫回銮皆出自忠君爱国之心，不应过分指摘。④ 尽管日本等国的情报为后世考察当时的政治实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线索，但其本质是为维护本国利益不被特殊时期的政治变局所损害，同时也是对两江局势变动及东南互保大局不保的恐惧，所以对于清廷官场人物的评判时常比附于“温和派”与“守旧派”的对立分析框架中，如此则观察到的信息难免偏见丛生，研究者必须审慎辨之。

另外，盛宣怀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值重视。纵观事件全程，从率先得到情报，到与刘坤一、李鸿章等大员说合，以及联络众领事，设计解决方案，调适道台人选等举动，在在均有盛宣怀从中筹划。盛氏并非疆吏，却在庚子年发挥重要影响，无论是东南互保，救援京官，还是此次上海道黜陟，均可觅其身影。盛氏得以屡屡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根源，在于其“传讯机制”掌舵者的身份。自光绪七年起便执掌电报总局的他在纷乱世道中广泛获取、传递中外信息，无论是北京的全权大臣、西安的行在，抑或封疆大吏、驻外公使，均需依赖其在上海的电报中转，信息往还之间，必然少不了对各类事件的交流、磋磨进而介入。若说当时清廷的“多角政治”已经崭露端倪，则盛宣怀无疑可被视作“多角”势力的“黏合剂”。传统信息渠道的没落与电报时代的演进，造就了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官场新贵，反映了晚清以降“政出多门”的权力多元化趋向。

质言之，由残砖碎瓦构筑的“上海道更易事件”，看似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迁转，实则有其隐

---

①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第 129 页。

② 参见曹峰:《鹿传霖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③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上册，中华书局，2018 年，第 77 页。

④ “A Defence of Lu Chuan-Li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4th May, 1901, p.4.

而未彰的权力纠葛：既是中外人士力图维系“互保”局面的重要举措，亦集中反映了庚子国变期间的对外交涉情形与政局变幻实态，是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国内权力博弈在上海一隅的集中展演。

References

Dai Haibin. “Xinchoutiaoyue tanpan qianhou de zhongfang quanquan wenti”(The issue of Chinese plenipotentiary before and after the negotiation of xinchou treaty). *Lishi yanjiu*(Historical research) 4 (2018).

Dai Haibin. “Yu Lianyuan: Cong tiemian yushi dao yangwu ganyuan: Shanghaidao yanjiu de yige gean”(Yu Lianyuan: from a “ruthless censor” to an “official good at west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Daotai). *Huadongshifan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ces edition) 3 (2012).

Jia Xiaoye. “Liukunyi yu wuxu jihai zhengju”(Liu Kunyi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1898 and 1899). *Shixue yuekan*(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4 (2017).

Liang Yuansheng. *Shanghai daotai yanjiu: zhuanbian shehui zhong zhi lianxi renwu, 1843-1890*(The Shanghai Tao 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3.

Li Xizhu. *Zhangzhidong yu qingmo xinzheng*(Zhang Zhidong And The Xinzheng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3.

Mao Haijian. *Wuxubianfa de lingmian: Zhangzhidong dangan yuedu biji*(Another Aspec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Reading Notes On Zhang Zhidong’s Archive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4.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 Study of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1900 through the Replacement of Shanghai Daotai

ZHENG Zemin（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1206272313@qq.com）

Abstract: In September 1900, an important personnel change suddenly took place in Shanghai, which had been saved from war by “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 Yu Lianyuan was replaced by Cheng Yiluo, the alternate official of Jiangsu Province. It seemed like an ordinary official appointment, but there were complex power contests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nsuls of various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s such as Liu Kunyi, Sheng Xuanhuai, Li Hongzhang, Rong Lu, Lu Chuanlin, and other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even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grasp the changes of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1900. At the same time, this event reveals the interwoven political modality of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is period.

Keywords: Boxer movement, shanghai daotai, 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 late Qing politics